



探索文明起源 需要多方发力

杨维军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协同发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加强综合研究。考古学以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叙述方式,或分工或协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究、阐释。把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超越传统文本写作的片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史和图景。例如,稷下学宫是先

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对于其始建年代、建于何处一直存在疑问。近年来,随着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稷下学宫的位置所在。可见,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状况,可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探究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发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与相关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比如,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可见,把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文明起源、形

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百余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涉及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化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此,考古工作者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展示工作,将其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好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故事。近年来,随着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战国时期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雾。可见,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让厚重的历史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更近,能够增强历史自信,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22年07月04日第09版)

会宁纪事

汪彤



14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一座座驿站像一盏盏点亮的明灯。

后周西魏丞相郭威西巡的队伍浩浩荡荡。西行历程,每到一处热闹欢腾。这位后周开国皇帝,效仿秦始皇、汉武帝西巡一座座边陲重镇。行至祖厉县,军士万众汇于此。“土人张信警资犒劳大军,郭威大悦,因置州以会宁为名。”这是《元和志》对会宁县得名的最早记载。

“纸衣瓦棺”是后世对后周太祖郭威充满敬意的赞扬。这位给“会宁”赐名的开国明君崇尚节俭,仁爱百姓,曾对宰相王峻说:“我是个穷苦人,得幸为帝,岂敢厚自俸养以病百姓乎!”他临死叮咛儿子:陵墓务必从简,只要纸衣装殓,瓦棺作椁。

想必后周时的会宁,依然以“苦”为患,会宁的苦在于缺水。水对一个靠天吃饭的西北县镇尤为重要,而郭威作为明君应是能够体谅到会宁的苦,他的赐名满怀希望:愿这座城池的百姓丰盈康泰“会聚于宁”。

历史的发展往往让人不可用常规去估量和评判。越是繁华越遭损毁,而“苦”,或许是会宁得以坚持,得以在历史浪潮中存在的一个原因吧。似乎从“苦”走过的人们,他们的包容性和接纳性更宽广、更稳妥。

1400多年之后的1930年冬,在疾苦仍然弥漫中华大地的岁月里,正当革命发展壮大时期,蒋介石却立即着手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

进行“围剿”。或许是苦难把人们逼到了会宁,“会宁,好地名啊,好地名,红军会师,中国安宁”。毛泽东主席预言般的警句,把希望带给了更多在苦难中煎熬的人们。

1936年10月2日凌晨的会宁,黄土连绵的远山沟壑纵横,在隆隆的炮火声和烈焰中,一支从宁夏同心城昼伏夜出、长途奔袭的神速队伍——红一方面军15军团直属骑兵团,以出其不意、全歼守敌的勇猛,攻克了会宁县城西门(后改名会师门),拉开了三军大会师序幕。

10月10日,明代建筑西津楼、文庙大成殿和四面的城墙上,高高低低的山洼里,人山人海,锣鼓鼎沸,红旗飘扬,这里汇聚着从“长征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中走来的红军战士。

四渡赤水的红军来了;巧夺金沙江的英雄们来了;突破乌江天险的战士们来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者们来了;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雅安夏山、昌德山、达古山五座大雪山、的战士们来了;越过无人烟的草地,激战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们来了……四面八方的红军战士,遍布这座千年历史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会宁在历史上的两次会师,一次得名,一次闻名。就在这一天,当夕阳染红大地,会宁文庙大成殿里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战士们用几张门板搭起一座主席台,又抬来一张大供桌当讲台,主席台上挂着“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大会”的红色横幅。中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在会宁文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会。这次会师意义重大,标志着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自此掀开了革命的新篇章。

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红军,经历生死,久别重逢后的人们紧紧握手和拥抱,尽管他们身上的伤口失声痛哭和愤怒,但此时人们手里挥舞着枪支、号角、红旗,欢呼声一阵一阵沸腾。

文庙大成殿里席地坐满了红军战士,大殿外数千名战士和群众举着红旗,点着火把,人们汇聚在胜利喜悦的欢乐海洋中。忽然鸦雀无声,人们安静地聆听朱德总司令宣读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出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通电》。这封贺电如今以一面墙壁的形式,雕刻陈列在会宁红军长征纪念馆。

贺电的开头很特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把营、连、排班长称为“首长”,这是中央文件、通电第一次这样称呼,这一独特的称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宽广胸怀。“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新政权、新中国的曙光。

有这样一组数字不得不让人们对中国红军长征再次惊叹:“红军长征中,红军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年龄不足20岁,14岁以上、18岁的战士占红军的40%以上,历任师长都只有20岁,师政委萧华上任时仅17岁……”

诚然,苦难的磨砺是最能让人成长的“磨刀石”。然而,就在会宁会师的前一天,在黎明到来的前夜,无数红军战士,却在炮火硝烟中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当红一方面军攻下会宁城不久,国民党军队便从兰州派来一架架飞机,轮番轰炸小城。

10月9日,就在会师的前一天,当一阵轰鸣声从远处传来,在街头贴标语的14岁无名小红军看到炮弹落下,义无反顾地扑向正在街头玩耍的一个3岁小孩身上。硝烟过后,孩子得救了,小红军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雪山没有挡住他,草地没有淹没他,枪林弹雨中他是铜墙铁壁。但这次,小红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了会宁百姓的安宁。

为了报答小红军,得救小孩魏煜的父亲把小红军埋在了自家的坟头,定下规矩,祭奠小红军像要对祖先一样,抔一把土,点一根香,焚一叠纸钱……这位被救的魏煜长大后,给自家的三个孩子起名继征、续征、长征——“继续长征”。

继续长征……万里长征的历史,如今被一座高33.33米的会师塔纪念着、颂扬着。到了会师塔跟前,你需抬头仰望,仰望便是一种致敬。会师塔高33.33米,是无限循环的意思,象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宁会师成为中国长征胜利的代名词。

一座从苦难中煎熬过却依然屹立威武的城池,必定有它厚重的承载力量。据《会宁县志》记载:仅明清两代,会宁考中进士有20人,名列甘肃省第三。文武举人131人,贡生396人。然而后辈的会宁人,更是继承长征精神和会宁会师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敢于胜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恢复高考,会宁已向全国各大院校输送大学生7万多人,其中博士学位1000余人,硕士5000余人,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达58名。会宁曾以奇特的“会宁现象”被全国看齐。一个农民家庭走出“双博士”“三博士”已不足为奇,会宁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能汇聚力量走向辉煌的地方。

然而会宁这座古老的城池,始终期盼子孙后代有“会(汇)聚于宁”的更多会师。这座在“苦”中煎熬过的城池,成就了大事,滋养了英才,这块贡献过的土地,理应盼望更多的获得。荣光照耀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走出去的一个人,更多的是走出去之后,再回报这块土地的高尚而伟大的付出。

甘肃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会宁更是贫瘠中的贫瘠。从孕育着8000年中华文化的甘肃大地上,走出了无数佼佼者。怎样将会师精神代代传承,让人类的智慧回馈生养的土地,让这块因天时与环境,在贫瘠土地上坚守的人们彻底结束“苦”的日子,这需要有创新精神的一次次“会师”,这需要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会宁儿女,一次又一次奉献“会师”的力量,这是一种值得深思和值得付出的“反哺”。

“会宁,好地名啊,好地名……”愿这座成就了会宁的好地方成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池之一。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永远朝拜敦煌

平山郁夫

“平山一定能到敦煌!”不知从何处飘来的声音。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是当然的。”日本之所以向往西方,向往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以至憧憬敦煌文化,是因为那里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中国文化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日本的。那时,日本正是太平时代,所以中国文化以天平文化之形态在日本开花结果。奈良文化是从中国传来的,构成日本文化基石的佛教,也是来自中国的。由此使我想到了,在中国不是可以看到和日本奈良时代相同的文化吗?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应当在奈良。如果我们从终点站奈良出发,向西寻找,理应找到日本文化的源流。我站在不二山远望落日。遥想在中国一定能找到日本文化,这就形成我青年时代的梦想,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

1958年,引导我走向未来的一条伏线出现了。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东京日本桥的高岛屋开幕了。展品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所长多年来亲手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彩色雕塑的复制品和照片。说是临摹,实则如真品一般。当我看到“飞天”生气勃勃、栩栩如生的姿态,看到北魏时绘制的大胆而有力的一幅幅壁画时,我被感动了。这次敦煌艺术展使我有机会和常书鸿先生会面并亲切交谈。常先生好像是来送敦煌香火的,这香火如能救我一命,我盼望去敦煌的念头更加强了。

我是广岛原子弹灾难的幸存者,原子弹后遗症、贫血症、白血病缠身,死神威胁,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正在我拼命挣扎时,命运转机的好兆头都一起来了。我在绘画构思创作烦恼时,一个僧人向我走来了。这个在没有水的沙漠里跋涉的僧人是谁呢?我苦思冥想,猛然顿悟:他就是“玄奘三藏”!这也许是玄奘三藏在给我指点前进的道路吧。不是玄奘,我日后也不会走上丝绸之路,更不会来到敦煌。奈良法相大东大药师寺主管高田好胤说:“是否玄奘先生转世为平山先生呢?”言毕哈哈大笑。人在面临巨大转机时,往往好像被某种超理性的力量所左右似的。在创作冲动的驱使下我开始作画,着力于新的感觉和手法,着力于潜在的内涵的描写,完成《佛教传来》。这幅画得到了画界权威的认可评价。“我得救了!”这一次的成功决定了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其后,我就抓住佛教这一主题进行创作。这年我29岁,跟当年玄奘踏上丝绸之路的年龄相差无几。这也许是某种机缘吧。1961年创作了《人涅幻想》,均获奖。谢天谢地,我终于被公认为专业画家了。到遥远的丝绸之路去旅行,将由梦变为现实。

丝绸之路从罗马、从印度、从天山北路与南

路、从西域南道或者从西藏、从俄罗斯,条条路线都汇集到敦煌。条条道路通敦煌。人们把视线集中到敦煌,不仅日本,世界各国都注视着敦煌。

去敦煌之梦,经历了20个春秋之后,1979年9月16日,如愿以偿。这是我一生的大事,我终于来到了敦煌。几度思念今相逢。天气晴朗,金光送爽,天空碧蓝。我看到了鸣沙山,看到了沙丘和鸣沙山之间的溪流。谷中有繁茂的白杨树,一片深绿。鸣沙山山崖断面上,九层高的建筑物出现在眼前,其中有大佛塑像。

夕阳落下,常书鸿先生夫妇及研究所诸君欢迎我。尽管事先听说“不能马上进莫高窟”,但我已急不可待,立即抱着写生簿走出来,外观我也想画呀!乘着西下夕阳的余晖,抓紧写生。沙尘悄悄地落在写生簿上。常书鸿先生和夫人一直站立身后,先生已是78岁高龄了。

次日,我被带进莫高窟。我所看到的是宝山,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窟中的一切,如同触电似的原地不动地停立着。“太棒了,太棒了!”我几度赞叹,非常敬佩留下这绝世无双的艺术珍品的前人们,感到无比幸福。从早到晚不停观看,三天才看了50个洞窟的壁画,这四天是我一生既兴奋又充实的四天。我站在这些壁画之前常常感到无法言表的激动,呆若木鸡。这些超越时空、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人的价值观的壁画,足以和近代法国的鲁奥匹敌。这说明一千多年前,有鲁奥水平的画家早已在敦煌存在了。我敢断言:敦煌壁画,即使放在世界美术作品中,也是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聚于敦煌。

拿敦煌壁画同日本相比,高松壁画出自通俗画家之手,是风俗画;法隆寺金堂壁画也是一流画家的世界性名画。1987年9月,世界各国的学者云集敦煌,举行“国际敦煌石窟讨论会”,这次我在敦煌看到了法隆寺,与其使用激动这个字眼,不如使用惊愕更为恰当。照明灯的强光一打,我不禁“啊”的一声。这一瞬间,我只能屏息凝视画面。在220号洞窟的壁画上我看到了:“雪白”的油漆打底。佛像的肌肉是用朱砂和胡椒粉混合成的“粉红色”。肌肉的线条是“朱红”色。毛发是“青绿”色。装饰品是“黄色”。衣服则是“朱红”“青绿”和“绿青”色。还用墨色。配色鲜艳,生气勃勃。线条细腻而有力,手指全是翘着的指尖,指甲短,露肌肉,技巧精湛。

这不就是日本法隆寺的壁画?这就是20年前的1967年3月到第二年春天我所临摹过的法隆寺金堂壁画。风格完全相同!画法、配色、结构、色感、造型的式样,一模一样!今天,同样的壁画

又展现在眼前。“这不就是法隆寺的6号壁画,3号壁画嘛!”我惊讶了一声。东京艺术大学调查团的成员们不怕疲劳,久久欣赏,如同被施了魔法似的原地停立不动。一位团员激动地带着哭泣般的声音叫了一声:“真了不起!”专攻绘画史的田口莱一说:“令人惊愕的是,画这些名画的一流画家都集中在一起,集体创作,实在难得。”和日本法隆寺同样的壁画就在敦煌。唐朝国都长安以西两千千米的敦煌和长安以东两千千米的日本奈良,绽开着同样高水平的艺术之花。

我坚信“艺术无国界”,优秀的艺术作品将打动世界亿万观众的心。文化力量是可以充分代表军事力量的防卫武器。文化并非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何况那罕见的名作集似的敦煌文化遗产。敦煌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它属于全人类。在丝绸之路之上,汇集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文化,而在“巨大、繁荣、辉煌”的敦煌,盛开着珍贵的世界罕见的文化鲜花。1987年9月的“国际敦煌石窟讨论会”满足了学者们的热切要求:将敦煌的美术、文化遗产传播到全世界人民之中去。

在敦煌艺术和玄奘三藏精神感召下,我访问中国20多次。有人提出让我设法保护敦煌文化遗产,尽管我的力量微薄,但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我要在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坐落在东京中央区,以保护敦煌遗迹为宗旨的“文物保护振兴财团”已于1987年4月成立。这是一个“文物红十字会”,倡议募集25亿日元作为当前需要的资金。我也得拼命干呀!“倾家荡产也要干!”我发誓说。

首先,我希望进一步加强敦煌莫高窟的调查,石窟内尚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其次,希望提供光纤观测器、立体照相机、超声波探测仪等最新的尖端设备给敦煌研究院,以期用这先进工具取得新的发现。其三,修建陈列名画临摹、复制塑像的展览馆以及资料中心。其四,培训保护文物的技术人员。其五,表彰有贡献的文化传播者和继承者。

我认为,日本国应在国际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展示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度和气魄。如果日本政府作为一项国策,对全世界的文物进行保护与赞助的话,那就好办多了。日本是否是世界上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做一个文物保护国呢?如果选择保护文化,以经济余力投入这项事业的话,岂不是在国际社会上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吗?这就可以迎来日本的国泰民安、持久繁荣。应该确信,日本能够利用文化的力量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